《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3 期，頁 287-323
2006 年 10 月
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一個歷史，各自解讀
——二二八小說及其相關作品選集的多元論述

洪 英 雪*

摘要

當高度敏感性的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從政治領域延燒到文學領域，當看待二二八事件的觀點關乎生命安全，當二二八事件的定義重大關乎台灣的定位之時，有關二二八小說的寫作與編輯，便很難像其他小說一樣保有獨立的創作而不受文學以外的因素干擾。首先，就小說創作而言，受寫作的時間地點、政治氛圍、發表刊物與作者政治立場等交錯影響，而產生官方觀點的、附和反共文藝政策的、親共黨階級鬥爭的、台獨等迥異立場的二二八小說。其次，二二八小說選集的編選，也呈現了以文學之名，行政治對話之實的論述交鋒，二二八小說與台灣文學史論爭一樣，成為台灣定位論述的爭奪場域。

關鍵字：二二八小說、二二八事件、二二八論述、反共文學

* 作者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One Histor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Multi-Discourses on 228 Incident Fiction and Its Anthologies

Hung, Ying-Hsueh*

Abstract

When hypersensitive historical incident such as February 28 Incident comes to have strong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when articulation of viewpoints might endanger personal lives, when interpretation of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aiwan, fiction writing on/about 228 Incident has no way of keeping itself to purely literary. In terms of fiction writing, the when, where and atmosphere of writing it, the periodicals to publish it,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deology each author holds, all contribute to different kinds of 228 Incident writings. As a result, the anthologies of 228 Incident fiction also show a strong inclination to engage in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name of literature. Accordingly, the fiction of 228 Incidents turns out to be the sphere where the discourses of Taiwan Status contending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mplexity and subtlety of issues involved.

Keywords: 228 Incident Fiction, February 28 Incident, discourse of February 28, Anti-Communism Literature

---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unghai University.

一、前言

在二二八事件仍是高度禁忌的時代，當文字工作者欲藉著文學記錄傳達這禁忌事件時，是正面迎擊國家機器或是迂迴閃避？也就是說，當二二八事件被消音，有關此事件的集體記憶若非全無就只能密談口傳的時代，二二八小說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世？當島內只存在著口徑一致的二二八說法，海外的二二八小說所呈現的事件面貌則與官方說法決然對立。其實，不管島內與海外，每個人所說的皆為事實，然都是部份的事實，這種「一個歷史，各自解讀」的現象，在以虛構為前提、書寫可能性的文學世界更是百花齊放。實則，作者的族群身分、發表的時間、投載刊物、作者所處的地點，都影響創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觀點。這些因素相互間的制衡並非縱線的環環相扣，而是更形複雜錯綜的環中有環。

當前有關長篇二二八小說的討論，多集中在吳濁流《無花果》、《台灣連翹》、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鍾肇政《怒濤》、陳燁《泥河》等；短篇小說則以李喬〈泰姆山記〉、郭松棻〈月印〉、李昂〈彩妝血祭〉等較受矚目。以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等之二二八小說而言，小說裡所呈現的觀點傾向於本土立場，批判事件當下國民黨政權處置之不當，導致發出怒吼的台灣人重思政治認同；林燿德則別出心裁，以原住民觀點譴責平地人「為了財富和語言相互屠殺」。[1]這幾部小說中迥異的敘事觀點與立場，頗具對話意趣。[2]

相較於這些甫出版便受關注的二二八小說，另有一些早被遺忘、忽略、或是新近新土的作品。如曾健民等從 1949 年的《中華日報》發現夢周的〈創傷〉、從 1978 年的《解放軍文藝》挖掘出周青的〈烽火鐘聲〉；另外僅被許俊雅《無語的春天》附錄所列名，未見任何作者與內容說明、當然亦未被評論過的白駒《梅春娘》；僅只岡琦郁子簡介過、目前未有中譯本的林文堂《台灣哀史》，都是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長年被遺忘的二二八小說。這幾部小說切

1 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看啊，瓦濤・拜揚，你眼前的平地人世界就要湧現恐怖中的恐怖啊，人和人互相屠殺，不為了勇氣，也不為了祭典，而是為了財富和語言，血的浪峰將要自北向南洪洪挪動。」（台北市：聯合文學，1990），頁182。

2 有關吳濁流、鍾肇政、廖清秀、李喬與林燿德之二二八小說的討論，見筆者拙著，〈論二二八小說的對話性〉，《第二屆苗栗縣文學——燿日明月論文集》，（2004.07.29-30）。

入二二八事件的視角迥異，因而小說中所呈現出的二二八歷史前因後果頗為異質、多元。照理說，對於同一事件有著迥異的注視點本為正常現象，只不過這幾部小說由於登載刊物鮮明的政治立場（如親國民黨之《中華日報》、親共產黨《解放軍文藝》）；作者直言不諱、引為小說標題的台獨宣言（《台湾哀史——蒋政権と戦い続ける独立運動者の手記》）；附和官方「戰鬥文藝」、儼然官方「共黨謀亂」說之文學演義等因素，在在令人聯想起黨派刊物、官方文藝政策、作者政治立場等對於詮釋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關係。忽略了這些旗幟鮮明的二二八小說，將使得以二二八小說旁證歷史真相與藉二二八小說進行對話的論述場域失真失色。這是本文前半部所欲探討的主題。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重要性從政治、歷史領域延燒到文學領域，不只小說創作如此，二二八小說選集的出版有更直接的論述對話。在目前可見的三本二二八小說選集中，便是藉文學選集以進行文學之外的對話，於此，文學似是佐證歷史的要角，實則淪為政治立場對話的配角。二二八小說與文學史論爭一樣，[3]成為台灣定位論述的爭奪場域。本文下半部即在探討編選二二八小說時，以文學之名行對話之實的論述交鋒。

二、二二八小說中敘事觀點的多元性與異質性

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過程的軍隊鎮壓、清鄉，以及延續到五〇年代肅共所形成的白色恐怖，二二八小說的寫作，幾乎很難像其他題材的小說一樣可以保有獨立的創作而不受文學以外的因素干擾，簡言之，小說寫作當時的時間、地點、政治氛圍、發表刊物與作者個人的政治立場，都產生交錯式的影響。研究二二八文學，不應忽略這幾個因素。

（一）文藝政策與二二八小說

1、小說裡的二二八事件

白駒《梅春娘》雖然不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小說，不過作者對二二八事件的描述，對於事件過程的取捨，在在呈現出鮮明的立場。究竟《梅春娘》

3 陳芳明於《聯合文學》連載《台灣新文學史》，才刊出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999年第8期），便引發陳映真對其史觀的反駁，兩人由此展開從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到台灣文學定位問題的論戰。

呈現出何種面貌的二二八？首先，《梅春娘》描述事件發生地點——天馬茶室，「是一切不潔人物的會集所。遊手好閒的到這裡來下棋賭博，毒品買賣者在這裡納錢探貨，仇恨廝殺者在此約期決鬥，幫會兄弟們在這裡歃血誓盟，人口販賣者到這裡來討價還價，煽惑家陰謀者到這裡來開會決策，打聽消息，散佈謠言。」（白駒 124）一個聚集罪犯、藏污納垢之所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想必不會是好事。其次，緝煙事件未發生之前，共產黨羽朱赤子已經在策劃引發一場社會暴動。小說接著描寫 2 月 27 日當天，朱赤子在永樂町教唆一個賣橘維生、不得飯飽的孤兒丁海丁到專賣局密告販賣私煙，朱赤子安坐在天馬茶室對面的酒樓上觀看整個過程；隨即，當「台北市各界的豪傑」齊集在天馬茶室討論處理方法時，朱赤子便主張到全省各地去創造武器，組織軍隊，「由奴隸變主人」（白駒 139）。而朱赤子所吸納的人全是失業者、退役軍人、當地流氓、遊手好閒者：

> 朱赤子到後門口唿哨了一下，七八個都是類乎雨傘節的低級族群的人：——沒尾壁虎、獨眼龍、臭黃蜂、黑沙魚、綠毛龜、眼鏡蛇、洪蜈蚣應聲而出，跟著朱赤子，像牛頭馬面、夜叉、無常等簇擁著閻羅一樣。這陰森森的一群，悽慘地向永樂町移動，街上人看見了他們，都不覺汗毛凜凜。（白駒 165）

在《梅春娘》裡，2 月 27 日起的社會動亂，便是圍繞著這一閻羅王般的策劃者與其下眾多牛頭馬面等「低等族群」所發生的暴動。

再者，強調共產黨人於事件中殘暴的手段。濫補濫殺之外，還活生生將一個嬰兒撕拉成兩半。這個共產信仰者朱赤子長著一副「死屍面容」、「妖魔靈魂」，心裡籌畫著：

> 他要組織一支隊伍，將來準備逐城逐街逐屋逐間的戰鬪，他要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開挖一條鴻溝，把鮮血流灌進去，把許多人推過那條血流成的河，使他們永遠不能回頭。（白駒 170）

這是《梅春娘》裡所描繪的共產信仰者的性格。共產黨憎恨資產家，為了共產革命掀起滔天巨浪，犧牲大眾性命也在所不惜，包括謝雪紅：

> 她對這社會的憎恨，使她不避斧鉞。……她要求許多人的血，來償還養女的淚，妓女的淚，酒女的淚，以及童養媳的淚。（白駒 133）

小說描述這兩個主要的暴動策劃者，不惜以「許多人的血」來宣洩仇恨，成就共產信仰。這樣的革命思想與手段結果如何？小說描述「毒龍似的新中國在血肉糢糊中顯現出來，各種的措施，和他的理想完全不符。」小說結束前作者仍不忘強調眾多當初以共產主義為中國新道路的人，紛紛向國民黨投誠。

2、官方檔案裡的二二八事件

若要以這個青史未書、街巷未聞、被國家視為禁忌與機密的歷史事件作為文學題材，怎麼寫，怎麼不觸犯官方以明則保身，當是最先要考量的，因而，順著官方說法將是最安全的守則。《梅春娘》裡的二二八事件過程，與官方所發表的觀點並無二義。首先，就事件起因而言，1947 年 3 月 22 日，白崇禧對全台的廣播裡歸結事變的遠因是「日本對殖民地所施奴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瞭解國情，以致於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近因則是「受少數共黨分子的惡意宣傳，誤中了他們陰謀，因此由於少數共產黨分子暴徒浪人的煽惑脅迫，台胞青年群起盲從，造亂叛變，使社會不安，人心惶惶。這反動派的野心，是要想顛覆政府，奪取政權。」[4]《梅春娘》並未強調日本的影響，而將重心放在共產黨人的有心謀畫。書中共產黨的代表人物——朱赤子——種種的殘暴醜惡，以及最後對共產社會的幻滅與懺悔，成了五〇年代以來，國民政府所提出的「共匪萬惡」的文學演義。而僅出現於事件平靜之後、即將偷渡出境的謝雪紅一段情節，也似乎是為了強化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裡的作用。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檔案：案犯處理（三）〉所附的「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中，謝雪紅的罪名便是「台灣共黨首領」，案由為「奸黨首要、暴動主持者」。[5]行蹤頗具神秘性的謝雪紅，私德與感情生活更是官方渲染的重心，國防部保密局的《附匪份子實錄》這麼描述謝雪紅：

> 因生性風騷，不安於室，十七歲時……在工廠與張樹敏姘識，未幾，被廠方開除。……又與對戶之青年林西陸姘居年餘。……[6]

4 〈白崇禧在台中向台灣全省同胞廣播詞〉，陳興唐主編，戚如高、馬振犢編輯，萬仁元審校，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卷（台北：人間，1992.02），頁678。

5 台灣省警備總部司令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台北：台灣省警備總部司令部，1947），頁55-56。

6 轉引自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1991.07），頁54。

長達六百多頁的《梅春娘》，謝雪紅出場的短短片段，作者不忘揮書附會她的私生活：

> 他崇敬她，愛她，那種愛比同志愛要多一點兒，他每次到台中的時候，都睡在她的床上。他認為她是台灣的貞德，她願意為一切被壓迫的婦女而流血。（白駒233）

國防部保密局的《附匪份子實錄》在當時雖然不是公開的文件，不過「交際花姿態」、「生活糜爛」形象，也便是當時民眾對於早遭污名化的「共黨首領」謝雪紅的單一印象了。

其次，就事件中「亂黨暴徒」的類型而言，小說所強調的類型也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所編《台灣暴動事件紀實》的歸結相符合——共產黨、「台灣自治青年同盟」、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海外歸來之台籍日軍軍屬、本地流氓、遣返之浪人、受共黨煽惑之青年學生、釋出囚犯、不得意之知識份子、因案被免職人員。[7]

最後，小說與官方檔案對於「暴民襲擊」的路線及細節有極詳細的敘述；反之，對於國軍如何「肅清暴徒」則輕描淡寫。引〈楊亮功、何漢文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版法建議案〉所述為例：

> 三月八日，台北之情勢更形嚴重。是晚，暴民自北投松山分兩路進襲台北市區，攻圓山據點、警備總部、陸軍供應局、長官公署警務處、台灣銀行等處。是日，憲兵二營由福建抵基隆開入台北。亮功與護送隊伍中突遭暴徒襲擊，調查員劉啟坤及士兵一名受傷。九日，警備總部乃重行宣佈戒嚴。十日，國軍第二十一師陸續開到，軍警開始徹底搜索。十日，長官公署下令解散各地處理委員會。於是台北自「二・二八」爆發之暴動事件漸趨穩定。[8]

行文只紀錄國軍「陸續開到」，「軍警開始徹底搜索」，似乎「暴動」也在和平合理的狀況下結束。

---

7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頁235。

8 〈楊亮功、何漢文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版法建議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頁265。

3、當文學遇上政治

自 1949 年起，文壇瀰漫著「展開戰鬥，反擊敵人」、「創造反共文學」等響應國家政策的文藝宣言，各種文藝寫作協會成立，附屬於寫作協會之下的刊物與文學獎是當時文學發表的主要園地，發揮著掌控文學生產的角色；1954 年 7 月推行「文化清潔運動」，致力於掃除文化界中「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1965 年，總政治部舉辦第一次國軍文藝大會，再強化戰鬥文藝的口號；1966 年，國民黨第九屆三中全會通過〈加強戰鬥文藝之領導，以為三民主義思想作戰之前鋒案〉，制定〈強化戰鬥文藝領導方案〉，往後接連幾次的中全會議，將國民黨的文藝政策正式納編於國家行政體系之中，形成了黨、政、軍聯合的文化改造運動，將環繞著「戰鬥文藝」的各各主題推向高峰。進入七〇年代，蔣經國將施政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與族群融合之上，對於文化思想的管控上從積極領導轉入消極防杜，因而文藝政策雖然仍舊發佈著，文壇多元化的發展大致上沒有受到太強的壓抑與整頓。直到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發生，為呼應此熱烈論戰，國民政府集黨、政、軍、救國團和文藝界力量召開「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嚴家淦於會議中表示仍需宏揚實踐總統蔣公的文藝政策，以發揮文藝的戰鬥力量，作為文藝創作者對國家民族的責任。鄉土文學論戰最後以王昇將軍的〈提筆上陣迎接戰鬥〉作為結束，這也是台灣文藝政策宣言的最後一篇文稿，早成強弩之末的文藝政策已無影響效應。[9]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梅春娘》的發表與出版。《梅春娘》是《文壇》雜誌於 1963 年推行的「十萬元大徵文」的得獎作品。此獎項分為「甲種」與「乙種」，《梅春娘》得獎的「甲種」一類，是「以描寫自由中國進步者」；「乙種」則是「以描寫金門堅強精神者」。[10]得獎後的兩個月，於《文壇》雜誌社連載（ 1963 年 6 月起至 1964 年 4 月），連載結束隨即由文壇出版社出版， 1974 年再版。《梅春娘》得獎、連載、出版的年代，正處於文藝政策第二個高峰期。

在獎項揭曉後的作者與作品介紹中，編輯介紹《梅春娘》的內容是：

9 以上有關五〇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演化，參見鄭明娳，〈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娳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

10 《文壇》34期，1963.04。

> 自高山同胞的生活描寫起，直寫到二二八事件背後的陰謀，以及藏在建設營中的敗類，暗示出台灣十年來之進步。作者對於社會各型態的生活有深刻的體會認識，材料也非常的豐富，為描寫台灣色彩獨步的傑作。[11]

連載首期的〈編後〉則再一次介紹《梅春娘》內容是「最深刻和最詳盡而最濃的一本本省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尤其寫『二二八』事件非常逼真，並將共匪在幕後的操縱寫得入木三分。」[12]儘管二二八事件在《梅春娘》裡所佔篇幅不多，得獎與連載介紹裡屢次提及二二八事件，並表示《梅春娘》優點之一便是揭露共產黨於二二八事件的陰謀。

除了國家政策的呼籲與各類文藝獎金的誘導之外，作為文學生產篩選機制的出版業界，也是助長文藝政策推行的重要機構。出版《梅春娘》一書的文壇社，由穆中南擔任社長。1954年，為配合「文化清潔運動」的推行，《文壇》雜誌發行專輯介紹「文化清潔運動」始末，[13]除了提出「戰鬥文藝」的口號，還於1955年10月出版了一套「戰鬥文藝叢書」，這套叢書涵蓋了理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劇本、木刻等十本書。創作者未必會按照出版商的觀點而創作，然，出版商卻有選擇符合其理念的作品來出版的權力。白駒《梅春娘》裡的反共色彩，與社長穆中南的意念不謀而合。

二二八事件當下官方大力宣導的共黨謀亂說與反共文藝政策的推行，便出現了應和反共政策的二二八小說——《梅春娘》。《梅春娘》固然表現了文藝政策於文學上的影響，它也代表台灣的反共文學於六〇年代的變化。五〇年代的台灣，反共與戰鬥聲喊的震天嘎響，鬥志滿滿，似乎反攻大陸指日可待。然而到了六〇年代，不再高分貝吶喊，只剩下消極的批判共黨之惡。一反多數反共文學以中國大陸為故事背景，《梅春娘》的故事發生在台灣，且深入台東山區。小說中並無「大陸山河」的描寫，也沒有冀返大陸的激情，只是藉由終於看清共產黨所建立的「毒龍中國」而歸返正道的迷途羔羊，來說明惡貫滿盈的共產黨終將不得人心。於是，於現實中日漸渺茫的反攻希望，在文學世界裡得到慰藉，即使反攻大陸的的政治口號喊的心虛，至少「毒龍似的新中國」終將失卻天道人心。

11 《文壇》34期，1963.04。
12 〈編後〉，《文壇》36期，1963.06，頁194。
13 「文化清潔運動專輯」《文壇》3卷1期，1954.09.15。

目前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多認定，從1949年戒嚴以來，到1980年代，台灣處於二二八事件的消音噤聲期，全島幾乎不見有關二二八事件的任何消息，[14]戰後出生的世代也因此對二二八事件完全陌生。然而，從《梅春娘》的例子看來，又似乎並不如此。《文壇》雜誌於當代，發行量頗大，影響力也不容小覷，《梅春娘》在《文壇》曝光率如此高——得獎、連載、出版、再版，其知名度應該不至於全無。小說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過程，自然也隨著文學的傳播而為人所知。《梅春娘》連載期間，《文壇》每一期的〈編後〉不斷強調《梅春娘》「得到普遍良好的反應」，[15]「多少讀者來函讚揚，本刊亦與榮也」，[16]甚至「不斷地接到海內外讀者來函推崇」，[17]連載結束之後，《文壇》刊出中央研究院徐高阮的文章，文中讚揚《梅春娘》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白駒的成就已然「超過了茅盾和巴金，錢鍾玉（筆者按：錢鍾書？）和張愛玲。他的真實、豐富、廣闊、有力，絕不是那些前面的人所能比的。的確這是五四以來未有的成就。」[18]

《梅春娘》所表現的二二八觀點，不只符合官方「共黨滲透」、「奸匪預

14 2003年夏春祥於〈新聞論述與台灣社會：二二八新聞議題的生命史〉中以戒嚴與否為指標，將二二八事件於台灣公共領域的發展過程分為「1947年至1949年的議題出現期」，「1949年至1987年的議題沒落期」與「1987年至2000年的議題復興期」三個階段。（《新聞學研究》（75期），頁203-234）2004年於〈尋找公共領域：論台灣社會中的新聞論述〉一文中，對二二八事件於臺灣公共領域的發展過程重新分期為「1947年的事件初始期」、「1948至1982年的社會失憶期」，以及「1983至2000年的眾聲喧嘩期」。夏春祥改變其分期的標準是，以二二八事件相關論述是否出現於公共領域為主，其中包括文學範疇。夏春祥將「失憶期」的結束往前推至1982年的理由在於1983年7月16日，《自立晚報》刊載了林雙不的〈黃素小編年〉；1984年3月11日，《聯合報》副刊專欄有葉明勳的回憶文章〈大時代中的新聞觸角——憶早年的中央社台北分社〉；1984年7月21日起，《中國時報》連載了郭松棻的〈月印〉等。夏春祥認為這些聲音代表市民社會萌芽的開始，不同於官方的聲音在被嚴格管控的大眾媒體中出現，因而二二八事件的社會失憶期，便由此時結束。夏春祥，〈尋找公共領域：論台灣社會中的新聞論述〉，收錄於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縣：桂冠出版社，2004年）。

如果要以二二八事件於公共領域上的出現與否來作為「失憶期」的分界點，並且包含文學作品；如果不將此論壇議題侷限於報紙上的新聞論述，那麼，「雜誌」算不算公共領域之一？如果將雜誌列入計量，那麼早在1963年，《文壇》雜誌頒與白駒《梅春娘》文學大獎、隨之連載、出版之時，二二八事件便已重現台灣公共領域。或者，《梅春娘》附和官方說法的觀點，不在夏春祥所謂的市民聲音之列，那麼，吳濁流《無花果》裡的二二八觀點絕對是「不同於官方」無疑。因而，如果將雜誌列入「二二八事件失憶期」的矩陣變數中，最早若非可以往前推到1963年，最遲也不超過1968年，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便已悄悄地在恢復當中。

15 〈編後〉，《文壇》37期，1963.07，頁170。

16 〈編後〉，《文壇》44期，1964.02，頁194。

17 〈編後〉，《文壇》46期，1964.04，頁186。

18 徐高阮，〈從「梅春娘」看自由中國文學的成就〉，《文壇》46期，1964.04，頁13。

先謀化」的結論，也沒有國軍抵台後的殺伐，宛如白崇禧來台宣慰時數場演講的宣詞重現。這也許便是在「二二八事件」仍為禁忌的時代，《梅春娘》一書仍得以出版、再版的原因。目前所見《梅春娘》有兩版本：除了民國53年的初版版本；國立中央圖書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圖書聯合目錄》裡，便錄有民國63年，仍由文壇社所印行的《梅春娘》。

《梅春娘》於六〇年代得允流傳，最主要的條件便是貼合官方「共匪謀亂」的觀點，只要符合此一觀點、再略過國軍抵台後的處理手段，二二八事件仍是可以傳之於世的。就《梅春娘》這一小說這樣的通行條件看來，想必對於當時社會上所能窺知的二二八知識，不會全無影響，小說中所載的共黨滲透、本土「低等族群」附和、外省人的災難日等二二八面貌，許是六〇年代二二八傳言中的一部分。《梅春娘》的例子可以證明，二二八事件於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並非完全密封的絕對禁忌，也未必是不可言說、不可觸及的死穴。也就是說，最大的關鍵不在於「不能說」，而在於「怎麼說」，怎麼敘述，怎麼詮釋。據此推論，發表時間僅差四年的《無花果》，屢遭官方監視查禁的最主要原因，倒未必是吳濁流觸及了不可言說的禁忌黑盒子，而是他的敘述方式、詮釋觀點出了問題。

同樣是發行於六〇年代、觸及二二八事件的小說，白駒的《梅春娘》得獎、連載、出版發行無礙；吳濁流《無花果》雖於《台灣文藝》連載時未受阻礙，然於1970年出版的單行本，甫一年便遭禁；[19] 1973年吳濁流再度闖關的《台灣連翹》，其連載與出版同樣歷經曲折，[20]甚至開創了兩年之內發行四種

19 《無花果》的發行過程頗為曲折：1968年於《台灣文藝》連載時不只未受阻礙，甚至引起日本《中國》雜誌的注意，將全文譯成日文，在《無花果》標題之下加上副標「台灣七十年的回想」，從1969年4月（第65號）到8月（69號），分五次於《中國》全文連載。繼而，《無花果》1970年10月於台灣出版的單行本，1971年4月便以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遭禁。1983年再於美國出版；1984年偷渡回台灣；1988年才得以在台灣公開發行。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封德屏主編，《台灣文學出版——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北市：文建會，1996），頁207。

20 1986年，適值吳濁流逝世十週年忌，也是吳濁流遺言裡所稱十年之期，鍾肇政與海外學者林衡哲、陳芳明等想盡辦法將《台灣連翹》的稿件偷渡出去，最後由鍾肇政之日本朋友們分散稿子，一人攜一小疊帶去日本轉交陳芳明。「稿子總算好不容易地才打發走了」，鍾肇政再為《台灣連翹》在島內尋求發表機會，當時《台灣新文化》表示願意連載，由1986年9月到隔年2月，共分六期刊登，然不出所料，因為《台灣連翹》的關係，《台灣新文化》被查禁了五期。鍾肇政，〈鐵血詩人吳濁流〉《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頁114。）

版本的記錄。[21]時移事異，文潮丕變的九〇年代，吳濁流的《無花果》、《台灣連翹》不只成為二二八小說的第一把交椅，其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甚至成為史學家引以為重的史料，而白駒的《梅春娘》反倒埋沒在歷史的煙塵裡。

（二）黨派刊物與二二八小說

個人獨有的生命經歷與政治立場將影響其人看事物的觀點，因此，即使針對同一件事情，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詮釋。以二二八小說來看，於 1947 年 4、5 月之間，夢周發表於《中華日報》的〈創傷〉與伯子發表於《文藝生活》的〈台灣島上血和恨〉正是一個有趣的對照。

夢周發表於 1947 年 4 月 20 日的〈創傷〉，是目前所發現最早的二二八小說。[22]〈創傷〉描述一對到台灣度蜜月的新婚夫婦，正巧碰上「民眾毀專賣局」事件，無法用閩南語或日語回答自己來自何處的丈夫受毆成傷，所幸遇上一對本省父子營救而保住性命。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國軍進駐前後為界，小說的描述呈現出極端的對照：在國軍進駐之前，馬路上是一群拿著木棍、揹著土槍，充滿了殺氣的人，「遠處近處都盪漾著暄雜的喊聲，還有鑼鼓聲，異國的歌聲，甚至夾有一兩聲槍聲，這些聲音匯集成恐怖的主流，重重的打在人們心靈深處」。這樣的混亂與恐怖場面，直到國軍進駐，「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曾健民 2004：68）[23]

〈創傷〉所呈現的二二八事件便是：被毆打的外省人；動亂中凶惡、殺氣騰騰的本省人；以及不涉暴動、救護外省人的善良本省百姓；最後是國軍進駐結束動亂，而國軍恢復社會秩序所採取的方法，已然畫下句點的小說未曾述及。這樣的版本與官方檔案所紀錄相差無幾。如 1947 年 3 月 20 日，白崇禧對台北市各機關人員的訓詞中說——「幸經陳長官敏捷及鎮靜處理，社會秩序及告恢復」。[24]四月，《台灣暴動事件紀實》中，不斷重複外省人遭受毆打，「只

21 《台灣連翹》的單行本出版方面，先由美國的「台灣文庫」出版，又有「南方」重新印行，最後才交由前衛出版社發行。鍾肇政，〈鐵血詩人吳濁流〉《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頁114。

22 這是單指小說而言，比〈創傷〉還早描述到二二八事件的文學是新詩，如雪牧〈一個台胞底話！〉發表於1947年3月6日，臧克家也有〈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發表於同年3月8日。

23 本文所引述夢周〈創傷〉與伯子〈台灣島上血和恨〉、周青〈烽火鐘聲〉版本，乃曾健民等編之《文學二二八》，以下正文內夾注之頁碼標示以（曾健民 2004：頁數）表示。

24 〈白崇禧對台北市各機關人員訓詞〉，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卷，頁677。

能坐以待斃」，直到國軍二十一師到抵基隆，「外省人開始感覺生命財產已獲國家力量之保障。」；「國軍開抵台灣之消息傳出後，全省各地秩序漸告恢復。」[25]

〈創傷〉在適當的時段畫下句點，使得讀者無法從小說中得知國軍進駐後的發展，面對這樣一個被強化為族群矛盾的歷史事件，〈創傷〉並不強調外省與本省人無法調和的族群矛盾，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超越族群界線的大愛，將人性的良善與光明置於憤恨之上，就在這樣的筆調裡，歷史事件中殘酷的殺戮與血腥也被淡化掉。

同年五月伯子的〈台灣島上血和恨〉則有不同的描寫。小說提及天真的人民受陳儀與楊亮功的緩兵政策欺瞞，對於事件的衝突有更直接詳細的描寫。同樣描寫到國軍進駐的這一段，正好與夢周的〈創傷〉成為對照：

> 從十時起，員山和車站那面就響著密集的槍聲，家家戶戶都閉熄了電燈……
>
> 他被迫顛簸到門外，在零亂的燈光下，烏烏黑黑押著一大串無話的台灣人，婦人小孩跟在後面哭哭啼啼，跪下去哀求，接著閃光的刺刀把這群犯人趕上大卡車……
>
> 被押著的台灣人，像給什麼重重的打了一擊。突然一哄子四散逃命了……，當他一腳掙扎的跨過窗櫺，一陣衝鋒槍的火網包圍著他，頭殼裡一團熱燙炸裂了。血如噴泉一樣濺開來，他一身破碎的到掛下來了……
>
> 發狂的北風撲擊著砂礫的地上，折裂了千萬的棕柏樹，撕碎了千萬的香蕉林，這裡，那裡，像千人萬人在奔逃，在呼喊。
>
> ——全城市罩在恐怖的槍聲中！（曾健民 2004：92-94）。

伯子〈台灣島上血和恨〉對事件中的血腥場面做這樣直接的描寫，是不可能發表於國民黨的相關機構的，的確，刊登這篇小說的《文藝生活》是由中共黨人、文化人司馬文森[26]所主編。而寫出「直到國軍進駐，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25 同上註，頁255-257。

26 司馬文森(1916-1968)，原名何應泉，筆名有林娜、林曦等，福建泉州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主編地下刊物《農民報》。1934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戰爆發後，受黨委派到國民黨軍隊中開展工作。後隨《救亡日報》撤至桂林，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救亡協會常務理事，創辦有影響的《文藝生活》雜誌。抗戰勝利後，輾轉廣州，恢復《文藝生活》，又辦《文藝新聞》。兩個雜誌被查封後，到香港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員、香港《文

的〈創傷〉，正是發表於國民黨用來「闡揚國策」的黨報《中華日報》。[27]

發表於共黨報刊《解放軍文藝》的有周青〈烽火鐘聲〉。小說裡除了還是對國民黨官、軍多所批判之外，懷有「工人意識」的作者周青，提出「要以階級矛盾看問題」，小說所呈現的觀點與共產黨訴求的階級鬥爭相仿。[28]如，武戰失敗，決定撤離台灣轉進大陸的阿興，感念母親的犧牲是「為要求自由，要求當家作主人，表現了被壓迫者淳樸、勇敢的犧牲精神」（曾健民 2004：435）。小說描述這次的暴動屬於「官迫民變」，主角阿興於桃園帶領的這場武裝起義還得到「延安解放日報」上的社論支援。小說甚至直接對二二八事件作定位：

> 「二二八」暴動是人民大眾要求解放，要求當家做主人的一場革命，是和祖國大陸的人民鬥爭聯繫在一起的。（曾健民 2004：418）

相較於親國民黨的〈創傷〉不觸及國軍進駐後的狀況，以及《梅春娘》以共黨作惡的角度看待二二八事件，親共黨的周青筆下的二二八事件則是人民反抗「蔣幫的恐怖統治」（曾健民 2004：435）。更重要的是，於中共政權早已穩固的 1978 年回顧這段戰鬥歷史，他要強調的不是國民黨暴政惡行，而是從定位這場革命的性質，來說明台灣人民與中國祖國從未分離。 1978 年，在國民黨政權依然強穩、報禁尚未開放、言論自由尚待爭取的時代，這樣的論點，也只能見諸於對岸以「歌誦社會主義與宣傳革命英雄」為宗旨的《解放軍文藝》了。[29]

匯報》主編。1952年主編《作品》雜誌。文革中去世。
資料引自網站：http://www.dqcx.net/xd/sima-wensen/000.htm（引用日期：2005.11.15）

27 《中華日報》於民國35年2月20日創刊。所有權歸屬中國國民黨。發行宗旨：闡揚國策，激勵民心士氣，改善社會風氣，提昇文化水準，促進團結和諧。相關資料參考網站：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5Swc_U1IfB4J:www.pu.edu.tw/~ecology/taiwan/c-6.htm+%E5%9C%8B%E6%B0%91%E9%BB%A8%E9%BB%A8%E5%A0%B1%E3%80%8A%E4%B8%AD%E8%8F%AF%E6%97%A5%E5%A0%B1%E3%80%8B&hl=zh-TW（引用日期：2005年11月15日）

28 藍博洲敘述出生於台北沒落望族的周青，於紡織廠擔任童工時期結識反日志士，因而啟發了反日民族意識與工人意識。周青於二二八事件時，在桃園加入林秋興領導的「人民武裝部隊」並與國民黨軍隊激戰，敗退後流亡上海。見曾健民等編，《文學二二八》，頁437。

29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成立於1951年6月，是中國惟一以出版軍事題材文學藝術類圖書、期刊為主的出版社。其前身為解放軍文藝社，1983年更名為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主辦《解放軍文藝》和《軍營文化天地》月刊。《解放軍文藝》所載作品為：「反映我軍在各個時期廣大指戰員的戰鬥和生活，著重歌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宣傳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便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書的基準點。
以上資料引自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7/29/content_999320.htm

歐坦生〈沉醉〉發表於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30]第11期「邊疆文學特輯」，這一特輯刊登了三篇「邊疆文學」，其中以「台灣土著小說」稱〈沉醉〉。這篇台灣土著小說正好提到幾個月前才發生到的事——二二八事件，並稱「這值得我們的政府記憶、也值得全中國人民紀念的壯烈的一個日子」，緣起於台灣人不滿當前的政治而盲目遷怒所有的外省同胞。歐坦生另一篇〈鵝仔〉，則是對於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的統治心態的譴責。[31]左翼刊物與「邊疆文學特輯」，說明了編者的立場——以階級觀點看待中國的邊疆地域「台灣省」所發生的事件。

報刊雜誌向來容易被當作宣傳信仰、擬塑思想的傳聲筒，尤其在國共戰爭依舊如火如荼、資產與共產思想壁壘分明的年代，附屬於政治團體之下的報刊是推行思想的絕佳工具。也因此，小說的內容與所投稿登載的刊物屬性便有幾近因果性的關聯。就寫作一事而言，「情節編織」（emplotment）的運作是不可少的過程，即便以真實為徵的歷史也一樣。如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提出的，沒有任何隨意紀錄下來的歷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個故事；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過壓制和貶抑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通過個性塑造、主題的重複、聲音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等——總而言之，通過所有我們一般在小說或戲劇中的情節編織的技巧——才變成了故事。[32]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中華日報》所刊載的小說內容當是「抬高和重視」外省人被毆鬥的事實，並「壓制和貶低」3月8日之後國軍的血腥鎮壓；反之，《解放軍文藝》所登出的小說也必是「抬高和重視」人民對蔣政府的積怨、國軍對人民的濫殺。通過這些選擇性的描寫策略，「一個歷史，各自解讀」的現象便不足為奇。

---

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lYd_IY4-wYUJ:jfjwy.periodicals.net.cn/url2.asp+%E8%A7%A3%E6%94%BE%E8%BB%8D%E6%96%87%E8%97%9D&hl=zh-TW
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PUM56gwbHNYJ:www.booktide.com/news/20000627/20000627026 3.html+%E8

30 范泉（1916-2000），原名徐煒，上海人。抗戰時期至1940年代後期，於上海主編《文藝春秋叢刊》和《文藝春秋》月刊。《文藝春秋》共出40多期，自1944年10月到1949年4月，為當時重要的文化期刊之一。
網址：http://www.bjyouth.com/view.jsp?oid=5278594&pageno=1（引用日期：2005.11.20）

31 呂正惠，〈發現歐坦生——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面〉，《文學二二八》，頁143。

32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3），頁163。

（三）政治理念與二二八小說

1、邱永漢《濁水溪》、《香港》

邱永漢自述從1946年2月到1948年10月這兩年間，他以生命為賭注參與台獨運動，具體行動便是於廖文毅的指示下寫了〈為台灣實施公民投票的請願書〉，主張台灣住民以投票方式決定是否歸屬中華民國。二二八事件之後，邱永漢感覺此事可能危急生命安全因而潛往香港，五四年赴日，赴日之後便不與廖文毅同其行動。[33]內容提及二二八事件的〈偷渡者手記〉、〈濁水溪〉、〈檢察官〉等幾篇小說便是邱永漢此時期的作品。不論邱永漢目前的政治理念如何，此段談話證實邱永漢曾有過台獨思想。

邱永漢寫作、發表於日本的〈偷渡者手記〉、〈濁水溪〉、〈檢察官〉幾篇小說，除了批判國民黨的「橫行霸道」、「封建性的榨取」，「與國民黨的衝突將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34]之外，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幾個敏感性問題，也是首破禁忌。如，首次描述隨接收人員來台的國軍軍容：穿著綠色棉襖、撐傘取代扛槍、把鍋爐放在籃內，用扁擔挑著行軍的國軍，讓引頸期待的民眾驚嘆失望。進而，描述被派遣來鎮壓二二八事件的軍隊是一支「配有美國新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兩軍對照之下，突出了國民黨處理事件中對民眾的殘刻。首次總結國民黨逮捕行動的對象以及事件的死亡人數：「全島有聲望者都遭虐殺，而以武力反抗陳儀軍隊的青年被槍斃的，據說超過五千人以上」。首次直言「下嚴厲命令以徹底手段鎮壓台灣人的，就是對日本宣布『以德報怨』的蔣介石本人。」[35]最重要的，〈濁水溪〉是第一個以文學形式駁斥官方說法的二二八小說：

> 陳儀為了掩飾自己的不正行為，卑劣地宣傳事件是共產黨計畫性的暴動。[36]

「少數共產黨分子暴徒浪人的煽惑脅迫」[37]一直是國民黨對民宣告的事件起因。對此說法，親官方者隨之附和，親共黨者樂與起舞，邱永漢則直指陰謀

33 岡崎郁子訪問邱永漢，見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台北：前衛，1997），頁126。
34 邱永漢，《濁水溪》（台北：允晨文化，1995），頁126。
35 同註34，頁141。
36 同註34，頁138。
37 〈楊亮功、何漢文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版法建議案〉，頁265。

陷構。就〈濁水溪〉而言，以文學形式闡釋歷史、臆測歷史動因、與官方隔空對話，早於五〇年代正式展開。

〈濁水溪〉是少數二二八文學中，反映出當年主張將台灣賦予聯合國託管與美國監護這一段史實的小說。[38]雖說邱永漢曾經參與台獨運動，然而其小說裡對於個人前途的關心甚於國家的發展方向：

> 我計劃搭乘這隻船到香港去。我無國家，也沒有民族。我是永遠流浪的猶太人。[39]
>
> 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要在沒有民族沒有國家的地方活下去。走吧，到能夠活得像人一樣的世界去活吧。[40]

超越民族與國界，只求人道的尊嚴與生活的安定，是邱永漢自傳體小說的主題，也是其二二八事件的劫後感嘆。

2、林文堂《台灣哀史——蔣政権と戦い続ける独立運動者の手記》

另一本很少被探討到的二二八小說是林文堂的《台灣哀史》。《台灣哀史》是作者以參與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為主的自傳類小說，林文堂於《台灣哀史》的〈自序〉便表明了：「以下乃是一個為台灣獨立運動奔走的青年的半生紀錄」（林文堂 8），《台灣哀史》的副標題——「蔣政権と戦い続ける独立運動者の手記」——表明了作者反蔣政權與台獨的立場。作者既然以副標題及〈自序〉強調其立場，可以想見小說裡將對蔣政權進行如何的批判。

小說從 1945 終戰、國民黨軍隊進駐台灣開始。關於國軍上岸的情形，同多數小說敘述相同：剛開始「台灣人充滿期待與幸福感」（林文堂 12 ），當出現在港口的船影越來越近的時候，數萬的群眾「響起狂熱的歡聲」，高呼「萬歲！萬歲！國軍萬歲」（林文堂 13 ）。然而穿著破舊軍服、揹著雨傘、鍋釜的軍隊，引起「見慣了日本帝國陸軍威風堂堂姿態」（林文堂 13 ）的台灣人疑惑：「這便是戰勝國的軍隊？」（林文堂 13 ）作者接著對「中國兵的素質」

---

38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 早有台灣的青年記者透過美國領事向國務卿馬歇爾請願，表明希望將台灣自中國分離，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同年九月，逃往香港的廖文毅在九龍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便是鼓吹聯合國託管台灣，並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台灣的歸屬，最終實現台灣獨立的目標。見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2002），頁312。

39 同註34，頁141。

40 同註34，頁142。

進行了一番極負面的評價。在簡單描述「蔣介石一族」、陳儀將軍等在接收過程中的貪污剝削之後，作者幾乎將中國人、「阿山」與豬化為等號，豬有「貪欲」、「污穢」、「怠惰」的特質，而「阿山」則是「無禮」、「無知」。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一開始採取逐日細述的方式，且著重在民軍武力對抗的過程。直到三月九日國軍上岸，基隆成了「阿鼻叫喚」、「地獄繪圖一般的光景」（林文堂 124 ）。

林文堂於《台灣哀史》最末頁以一「作者略歷」介紹自身簡歷。本名林一忠的作者，出生於 1928 年， 1947 年參加二二八事件，從 1949 年加入獨立運動以來，寫作《台灣哀史》的當年（ 1972 年），仍為「台灣獨立總同盟盟員」。[41]結合小說內容、副標題、〈自序〉、「作者略歷」來看，《台灣哀史》所呈現的儼然是林一忠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並因之走向獨立運動道路的自傳類小說。

這是解嚴以前的二二八小說中，對蔣氏政權與「阿山」批判的最直接強烈的一部。可以想見，即使小說不是以日文寫成、在日本發行，在 1972 年、仍處戒嚴期間的台灣，這樣的內容也過不了國家的檢查機制，終究只能留存海外了。時至今日，未有中文譯本的《台灣哀史》，不僅使二二八小說的研究有了缺角，藉著二二八小說所引發的論述場域也缺少一力場（field of force ），畢竟，對於本土派所強調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獨意識萌芽關鍵——論述，《台灣哀史》是有力的文學見證。

三、二二八小說的弔詭
——歷史真相，不在歷史現場

二二八事件的血腥鎮壓延續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無所不在，文壇自不能豁免。議論政治有惹禍上身的可能，以政治或歷史事件作為文學題材也得小心翼翼。因此，作者所在的空間地點，關係著作者是否能無所顧忌暢談己見，間接也影響了作者的寫作手法。

首先，身處台島風暴核心者，為免惹禍上身，堂皇的官方說法是最安全的

41 1950年廖文毅於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時，林一忠兼任秘書長與中央委員；1956年，廖文毅、吳振南等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林一忠亦為政務委員之一。

法則。〈創傷〉「抬高」外省人於事件中的災難，「壓制」了國軍的屠殺，這樣於官方無傷且有益的內容，就算不是有意為官方幫腔，也不至於危急性命。《梅春娘》裡描述萬惡共產份子是二二八動亂的燎撥者，也對了官方反共的味口。其次，若是壓抑不了紀錄真相與正義見證的慾望，就只有訴諸隱晦的筆法，葉石濤〈三月的媽祖〉即是。[42]然而，儘管小說中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也沒有直接提及二二八相關的人事，葉石濤還是沒能躲過這場從事件延續下來的風暴。1951年葉石濤被捕入獄三年，即便入獄主因無關乎〈三月的媽祖〉，[43]這場牢災讓葉石濤沉默了14年，棄筆噤聲，直到1965年才又重出文壇。最後，一但隱晦暗示消溶不了正義的慾望，筆下真相逾越了官方容忍的限度，輕則查扣書籍，禁書了結，重則牢禍傍身了。吳濁流1948年的〈波茨坦科長〉中，對於二二八事件只是影射的略微帶過。念茲在茲這段歷史無人見證恐被遺忘的吳濁流，於1968年起連寫了兩部代自傳性質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來紀錄二二八事件，吳濁流「遠述日治時代背景」的寫作策略未起效用，小說末幾章的細述罪狀仍舊不容官方，兩部小說以查禁收場。

島內作家於文網高張的處境下，即便是純文學的創作也得步步為營。反之，隔著安全距離的海外作家，屏除政治報復的恐懼，故能無所顧忌的暢談所見所聞與所以為。強調國軍屠殺的〈台灣島上血和恨〉，曾健民推測作者伯子應該是二二八事件便逃亡大陸或香港的台灣文化人。強調「要以階級矛盾看問題」，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人民大眾要求解放，要求當家做主人的一場革命，是和祖國大陸的人民鬥爭聯繫在一起」的〈烽火鐘聲〉，作者周青早於二二八事件後便流亡上海。直言「蔣介石屠殺」的邱永漢、直接將小說副標定為「独立運動者の手記」的林文堂，其小說都寫於、發表於日本。

作者創作當下與空間地點的影響如是，而小說刊行的地點則關係著讀者認

42 王德威編著的《台灣：從文學看歷史》是一部以文學反映長時段台灣歷史的文學選集，編者自詡「希望凸顯作家筆下的台灣經驗是如此繁複多樣，應該激盪出更多想像歷史的方法。」選文含括原住民神話、明鄭古典詩文、日據時代作品、戰後、當代、e世代作家等。其中第十八章〈憂鬱的二月〉便以二二八文學為主，王德威選了〈三月的媽祖〉，並云：〈三月的媽祖〉這種模糊其詞的方式，反映了傷痕文學該怎麼寫、怎麼讀的問題。另兩篇為楊照小說〈黯魂〉與林亨泰新詩〈群眾〉。王德威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5）

43 雖然葉石濤自述被補原因：「我竟然是因戰後第二年，也就是二二八發生的前一年1946年的瑣屑事情而被捕的。」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1951年回溯到1946年的瑣碎事情而逮人，即使罹惑因素不在〈三月的媽祖〉，也與二二八事件延續下來的風暴脫不了干係。

識事件的面向。島內與海外的二二八小說，便有了兩種迥然不同的面貌：島內讀者藉著文學所能了解的二二八事件，便是3月8日之前的奸黨暴動，外省同胞的十日災難。國軍的進駐，只是保護善良百姓的正常政策，沒有屠殺，無冤可埋。反之，海外讀者如果只是透過〈台灣島上血和恨〉、《濁水溪》、《台灣哀史》認識二二八事件，則二二八事件便是獨裁蔣政權的強霸統治、本省同胞的人間煉獄、台灣人民的血淚冤案。

如上所述，從作者所處空間與讀者閱讀書籍來看，歷史的弔詭陡然而現：歷史真相未必能在歷史現場尋獲；更甚者，越接近歷史現場，對於事件的掩蓋、扭曲可能較他處更甚。不論作者侷身島內或浪遊海外，不管小說內容是不得已的婉轉迂迴、刻意的避重就輕、有計畫的添火加油，所呈現的都只是真相的一角。即使再怎麼嚴謹的律己客觀，對於某段歷史的詮釋與再現，都將烙印著個人的生命體驗與時代侷限，因為沒有人能外在於歷史。也因此每個人說的都是真相，每個真相都只是部分的、未完成的。歷史真相不只不存在於任何單一的一個角落一個論述，即便是眾聲喧嘩所拼湊起來的確證，也只能是「延異」（ différance ）般的再現，「意旨」（ signified ）不只永恆缺席，更早在時間的流動中一去不返。

四、二二八小說選集的文學性與政治性

數不盡的單一事件在時間的綿延流轉下組構成歷史長河。文學中以歷史事件作為主題的不在少數，但從來沒有一個歷史事件能夠像二二八事件一樣，在份量上足以構成單一主題的文學合輯。1989年林雙不編選的《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是最早的一部二二八小說選集；14年後，許俊雅編選的《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出版；隔年，2004年，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編選的《文學二二八》隨即問世。這三本選集前後相隔14、15年之久，基於出版的時間點、政治氛圍、史料流通與出土、文學的持續創作等因素，所收錄小說篇章自然會有所差異；再者，第一本選集與後出的選集，也將因其不同的定位與目的而影響小說的汰錄。第一本選集所具有的開山祖特質，便可能存在著讓讀者從文學認識二二八事件的目的，而後出的選集在選文上便必須與前出的選集有所歧出。更甚者，從篇章的篩選上，不只表現出編者的意識形態，選集一多，便呈現出對話交鋒的現象。

（一）收錄篇章簡析

1、重複收錄篇章

以同樣的歷史事件為主題的文學選集，免不了會有重複入選的小說。丘平田的〈農村自衛隊〉與伯子〈台灣島上血和恨〉便不曾被遺漏過。丘平田的〈農村自衛隊〉與呂赫若的〈冬夜〉通常被當成是台灣社會衝突的「預告」之作，這樣的預告之作出現頻率之高，可見二二八文學的編選者極重視事件爆發前的社會狀況，為事件的發生作鋪陳，這兩篇小說成了揭開二二八文學的序曲。而距離事件發生時間最近、直接描述事件血腥衝突的〈台灣島上血和恨〉，被認為是與歷史過程同步進行、真實描寫歷史事件的原來面目、未被歷史禁忌和意識形態所渲染，[44]因此幾乎被當成了二二八文學的首篇必讀書目。

第二本二二八小說選集——《無語的春天》出版的2003年，〈附錄〉整理統計述及二二八事件的長、中、短篇小說，多達71篇，在小說選擇上，自然比1989年的《二二八台灣小說選》多了許多選擇，然而，相隔14年的兩本選集，重複率還是高達五成。除上述兩篇之外，許俊雅分析了另三篇重複小說的特點：林雙不〈黃素小編年〉以女性人物黃素的弱勢和無辜，作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象徵；李喬〈泰姆山記〉不只賦予人和自然、人與大地的終極關懷，更把這一題材的反省精神推到至高境界，並開啟新世代作家一則寫作方向；[45]楊照〈煙花〉則強調人性的美好。相較於前述幾篇寫成於事件前後的作品著重於社會現實的陳述，這三篇作品也各具典型，可算是歷史事件昇華為文學象徵的代表。

2、各書獨收篇章

（1）林雙不 《二二八台灣小說選》

林雙不《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書後的〈附錄〉羅列了自1947年2月以來「涉及二二八歷史的重要小說」書目，從這書目可以發現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小說在1989年之前並不多。時距解嚴不過兩年，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才剛開始，島外的史料未被發掘，且1990年之後，二二八小說的創作才蓬勃生發。〈附錄〉中，林雙不以符號「■」標記了小說內容是否直接反映二二八事件。以這樣的

44 編選序，〈「小說中的二二八」〉，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頁12。

45 同註34，頁9。

分類為主，林雙不所選的小說有七篇是直接反映二二八事件的。可見林雙不著意於能從文學看見歷史。

宋澤萊〈抗暴的打貓市——一個台灣半山政治家族的故事〉以魔幻寫實的技法描述一對李姓半山兄弟出賣台灣以致富升官的故事。1987 年林雙不為前衛出版社編選年度小說選時已收錄此篇，序文中對宋澤萊「為了建立民族自尊，為了延續民族語言」而運用台語漢字寫作小說的開創性予以高度肯定。僅隔兩年，在以二二八為主題的小說選中再收此文，足證林雙不對這篇描寫「台籍政客的典型」的小說的讚賞。這篇台語漢字與北京語兩版本並俱的小說傳達了——同族群的出賣比異族群的欺壓更為可恨——的意念。

林深靖〈西庄三結義〉中，未曾提及「二二八」這一名稱。在小說中，這發生於三十多年前的事件仍舊是「秘密」，小說這麼解釋事件原委——「有些剛從大陸過來的人太霸道，欺壓老百姓，跟本省人起衝突」（林雙不編 1989：191），導致很多村民被逮捕，30 年了無音訊，而被憤怒村民抓來「關人抵帳」的某一外省人，在長達 30 年的囚禁下也早已瘋癲。這篇小說說出了下一代對此事茫然不解的原因：「課本上又沒寫，你當然不知道囉！」（林雙不編 1989：191）〈西庄三結義〉一方面表現了事件的「禁忌」真況，一方面說出了國家機器主導下所產生的代際之間的記憶斷層。故事中三個不分族群的結義死黨與故事末了將事件死難者「義士」與受累外省人「唐山」合葬，讓族群和解與寬容原諒的氛圍流盪於小說尾聲。

林文義〈風雪的底層〉描寫的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肅紅網羅的無所不在。〈風雪的底層〉中，男女主角突破省籍仇恨而相知相惜，政治上對台灣前途的迥異期待並不妨礙他們單純的相愛。然而當民間化解省籍仇恨，當權者卻手持利刃，容不得任何異議雜聲，寧可錯抓一百個熱愛國土者，也不肯放過一個共產思想嫌疑犯。青春年華的外省女子，白受了 14 年牢獄之災；對於國家愛深責切的本省男子，漂迫海外歸鄉不得。〈風雪的底層〉未直接呈現二二八事件，卻更深刻的描寫了殺戮雖過，傷痕卻未完；刀刃所及，難分省籍的政治餘波。

同樣描寫紅網高張的葉石濤〈紅鞋子〉，在獄方所羅織的罪狀中更上溯二二八事件，表現出官方觀點所宣揚的兩事件的敏感性——接觸匪書匪方思想者，極可能是二二八暴動的聯絡人共謀者。小說中，簡阿淘與信仰共產主義的辜雅琴的對話論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 我們雖然同情被欺壓、被剝削的廣大中國民眾，但是我們更關懷的是如何從陳儀的惡政下求得解放。我們台灣民眾的再解放並不需要和祖國大陸的解放運動取得聯繫。我們相信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已經使台灣人締造了共同的歷史命運，唯有台灣人站起來，才能把台灣建設為「台灣人的台灣」這樣一個天堂。[46]

小說中所提出的——四百年來所締造出的共同的歷史命運，正與林雙不於序文中提到的「晚來的中國移民，無論是自願，無論是被迫，都必須慢慢從中國人轉換成台灣人」屬於同一立場，島上住民已是命運共同體，唯有互相疼惜照顧，合力建設出「台灣人的台灣」，才是住民未來的路。

（2）許俊雅《無語的春天》

《無語的春天》〈編選序〉裡，許俊雅簡介二二八小說發展，分析性別、世代在二二八小說中的不同面貌，然並未說明其書與林雙不的《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有何差異。許俊雅未談其編選的第二本選集與第一本選集的差異，不過，翌年出版的第三本選集便替前兩書做了歸納。

橫地剛認為林雙不與許俊雅這兩本選集所選小說，有七篇是未親歷事件的新世代作家作品，此屬「後日談」。[47]其實，七〇年代以後作品的選入，正表明了編選者所著意的除了事件真相之外，二二八文學的文學特質與經由二二八事件所延伸出的反省思考、人道關懷等，更是後世子民該從事件中學習的訓示，畢竟，所編學科為文學選集而不是歷史選集。吳豐秋《後山日先照》便是這樣一篇強調族群融合、寬容原諒、關懷邊緣弱勢的優秀作品。在這部小說中，不論是本省、外省、原住民、日本人、甚至美國人，都能夠泯除差異的完好相處，當然這透過的是一對本省丈夫北印與外省妻子雨綢神仙般善心的感化。人性的善良化解一切仇恨，在這部小說中有最極致的發揮。

蕭颯的《返鄉箚記》以日記體的方式記述一個「經歷了做一個台灣人的所有痛苦」的夫妻，「日本人在時，中國人當我們是日本人，日本人當我們是台灣人。……而現在，為什麼又有什麼外省人打台灣人，台灣人打外省人的事情發生呢？」（許俊雅編 229）她的境遇與感嘆令人聯想起吳濁流筆下的亞細亞的孤兒。在《返鄉箚記》這部長篇小說裡，二二八事件只是台灣政治紛爭的一

46 林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台北：自立晚報，1989），頁336。
47 橫地剛，編者語二〈台胞的眼睛是雪亮的〉，《文學二二八》，頁24。

小段，也是書中主角人生經歷的一小段，蕭颯以女性角度、庶民經歷來看待政治紛爭，表現了一個小老百姓「希望國家強盛，不要再受別人的欺侮，不要再有戰亂」的願望。

李渝的〈夜琴〉也呈現了類似的意識。李渝〈夜琴〉以一位外省女性的長年等待，等待戰爭過去來訴說小老百姓對於安穩平凡生活的期待。儘管不懂政治無涉事件，女性仍為了身邊的男性而間接受害難。男人願意為國家出征，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女人要的只是可以陪在身邊的相愛男人，安穩幸福的生活。然而，平凡的女人追尋平凡生活總是不可得。

許俊雅認為「具有更加開闊的人文視野和世界眼光」的新世代作家，不只將反省藝術境界推向極致，對二二八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嘲諷，也在新世代作家筆下完成。李昂〈彩妝血祭〉以王媽媽從受難家屬變成反對陣營的精神象徵，反省了可以公開、大聲說出來的二二八，反倒成為政客操弄的棋子。在戒嚴的時代，政治霸權使人們假裝二二八事件不存在；解嚴後，此事件被有心的政客捏塑成各式樣態，虛偽與假裝只是換上另一副面具繼續存在。世俗化、儀式化使二二八的精神已然死去。而李昂將二二八與同性戀並置，更表明了壓抑與禁制的無所不在，永遠有人處在權力的壓制與迫害，待解禁的、需得到平反的、需要得到公眾諒解的何只是政治上的二二八！

（3）曾健民等《文學二二八》

第三本二二八文學選集編者群認為其書大異於前二選集之處有三：首先，《文學二二八》強調以多種文學體裁「全面反映二二八」，除了小說之外，還收錄了新詩、古典詩、報導文學、戲劇、散文等作品。其次，《文學二二八》收錄了刊載於大陸、香港的出版品，突破了只侷限於島內的二二八文學創作。最後，《文學二二八》所收錄的篇章為事件發生前後的作品，作者多是親歷親見二二八事件者。

歐坦生〈沉醉〉描述因二二八事件受傷的外省人楊先生，如何敷衍欺騙照料他傷患的台灣女子阿錦。小說著重於刻畫戀愛中的女人心理，呂正惠評為「小說似乎成為『痴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因而削弱了它的社會意涵」。[48] 歐坦生的另一篇〈鵝仔〉同樣不是以二二八事件為敘事主軸，故事描述台灣男孩阿通心愛的鵝仔被「那邊人」處長太太扣押，要求以一千元作贖，當阿通發

48 呂正惠，〈發現歐坦生——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面〉，《文學二二八》，頁140。

現鵝仔已被烹煮，氣憤的咬傷處長太太，旋即被荷槍警衛打的滿頭滿臉青紫紅種，最後還是父親與姊姊低聲下氣的陪不是、扣薪餉才了事，小說最後以「我們是同人家強不得的……」結束。呂正惠強調這兩篇是「發表在大陸的左傾刊物上的」、[49]外省作家為台灣人打抱不平的小說，可見作者並非以省籍來劃分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陳映真更直言這些省外作家的作品證明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民並不孤立，他們得到了大陸無數同胞的聲援與支持。這些事實「有力地揭穿了『台獨』分子所謂二二八事變是台灣人對大陸人的壓迫與加害的反抗，是台灣人尋求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起點這種罪惡宣傳混淆是非的真面目」。[50]林斤瀾〈台灣姑娘〉以回憶的方式敘述一個外省教員與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學生領袖以抵抗國軍的台灣姑娘的故事，兩人同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捕入獄，堅毅不屈的台灣姑娘最後死於獄中。

綜而言之，從文章後附的〈編註〉來看，本書極強調文章中所表現出的歷史真相與社會現實，並且，編者認為這些文章能證明「事件中受害者是不分本省人外省人的」，期使「每一個人都會從狹隘的省籍悲情和族群怨恨中解放出來，昇華為寬容與愛吧！」[51]

儘管編者已明確的說明其立場，然，此書於小說汰錄上卻有兩個值得再探討的例子。其一，曾健民於2003年編輯《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時，便已收錄伯子〈台灣島上血和恨〉這篇並非新出土的小說，隔年的《文學二二八》又再收錄此篇小說，足見曾健民等對此篇小說的重視。其二，既然強調所收為事件前後親歷事件作家的作品，卻獨漏了發表於一九四九年的葉石濤〈三月的媽祖〉。或許影射性、模糊其詞的表現方法是〈三月的媽祖〉落選的原因。若是，則從中看出其書編者群對二二八文學的定義——直接描寫事件者。然不論如何，〈三月的媽祖〉作者葉石濤的身分與政治認同，卻不免惹人非關文學的遐想。

49 同註42。

50 陳映真，代序〈母親的叮嚀——拜見詩人臧克家先生〉，曾健民研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3），頁4。

51 曾健民，〈難忘的日子〉編註，《文學二二八》，頁350。

（二）編輯目的簡論

1、林雙不——從文學看歷史

林雙不在〈見證與鼓舞——編選序〉[52]中描述了自己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過程。某日高中英文老師不意吐出一個陌生名詞——二二八，隨即面露驚惶，顧左右而言他，拗不過青年林雙不的死黏糾纏，英文老師驚惶地、斷斷續續的語句中，只說了那是很多年前「芋仔番薯抓狂台來台去」的事情，並再三叮嚀青年林雙不「千萬千萬不能在外面亂說……，包括自己最親近最信任的人都不能說。」英文老師殘缺而不完整的說辭點燃了林雙不好奇的火苗。然而，歷史教科書上沒提供答案，坊間書籍上也找不到任何資料，最後對二二八事件較為全面的認識竟然是從吳濁流的小說《無花果》。這便是一個最直接例證，當歷史事件成為政治的禁臠，窺探歷史奧秘的窗口竟是文學。接著，林雙不說明目前坊間所見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雖然較易取得，然不論在數量上或流傳普遍性來說，「對喚醒台灣人這一目標而論，都還非常不足。」這便是出版這本選集的必要。可以說從文學認識二二八，促使遭到國民黨塵封的二二八事件增加曝光率，是此小說選集的目的。此外，林雙不還提出小說反映歷史的特殊效果：

> 作為一種文字藝術，小說有它不同於一般史料的感情價值，軟性的、委婉的、側面的，經常卻更能打動人類的心靈，引起更深的共鳴，同時產生不同層次的啟發。[53]

除了冀以小說打動人的心靈情感之外，「這本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小說選，還可旁證台灣文字工作者對記錄鄉土悲愁、追求鄉土和平正義的努力與誠意。」[54]言下之意，幸有民間文字工作者秉持真誠的心，努力記錄鄉土悲愁、追求正義和平，官方的一元論述才得以顛破。

2、許俊雅——歷史傷痕的文學昇華

相較於林雙不的選集期以文學「喚醒台灣人」，以文學啟蒙與鼓舞「被統治的廣大人民」，許俊雅的〈編選序〉也從敘述二二八事件的禁忌與解禁起筆，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在時勢的推移中，自覺或不自覺的追求自由與自

52 《二二八台灣小說選》之中有關〈見證與鼓舞——編選序〉的部份並未編列頁碼，因而本論文引文也只列出文章篇名，不列頁碼。

53 林雙不，《二二八台灣小說選》〈見證與鼓舞——編選序〉，未編頁碼。

54 同上註。

主的行動，這場行動在國家機器猙獰的暴力底下，無論本省與外省人民，同在心靈與精神上受到震懾，傷痕延續40、50年。時至今日，後世應該如何看待事件？許俊雅以烏蘇拉・列岡等待吹笛人的寓言故事表示：唯有清晰記得悲痛，才能真正告別悲痛；唯有記住摧枯拉朽的過去，才能保證幸福安寧的將來。記住過去，告別悲痛，是通像幸福未來的最佳途徑。就歷史而言，二二八所象徵的不再是悲情、仇恨，而是積極再生力量，是台灣人抗議不公，要求民主改革的精神，是台灣歷史文化的可貴資產。就文學而言，二二八業已成為一種象徵指代，其意義遠遠超越歷史事件本身對社會歷史認知的覆蓋率。所謂的象徵指代即是「人民對於獨裁政治所製造的恐怖生活的一種抗議」。在這樣的象徵意義之下，文學超越了歷史，成為台灣文學的經典題材。因而，文學作為一種悲劇精神的提升，許俊雅更看重的是作家對人性力量的頌揚，即在面對歷史慘劇時所採取的悲天憫人和對仇恨的反省。[55]這該是點出了這本選集的編選態度。

整體而言，許俊雅〈編選序〉所呈現的政治譴責未若前者強烈，出版目的也不在於糾官方之謬。況且，在2003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已編列教科書，紀念公園陸續落成，補償條例通過法案，紀念儀式定期舉行，文學已經不是認識歷史的唯一窗口。不論是歷史二二八或文學二二八，都已經成為抗議暴政與追求自由的精神象徵，因而，認識二二八小說的發展、二二八小說於不同世代下的題意轉變、與女性視角的二二八書寫，除了可見證「文學」在混亂艱困時代下的崎嶇道路之外，更是充分理解與欣賞已然昇華的二二八精神的最新視角。

3、曾健民等——遲來的歷史真相

曾健民於序文中直言沒有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作家的作品，不只在時空、感情、意識形態上會有落差，甚至這些作品是在二二八已經成為高度政治圖騰省籍情結渲染之下的作品，難免烙上主流政治的烙印。[56]因而《文學二二八》所選的作品大部分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的所創作的，「這些作品直接表現了作家經歷二二八事件當下的文學感情，用文學直接反映了事件的真相，我們通過這些作品真實地感受了當時火熱的、激動的歷史。」[57]可以說，本書編者群認為親歷事件者與寫作於事件發生前後者，要較「本於風聞乃至聞書而創作出

55 見《無語的春天》編選序，〈小說中的「二二八」〉，頁6-9。
56 曾健民，〈諦聽——歷史的聲音〉，《文學二二八》，頁16。
57 同註56，頁17。

的作品」[58]表現出「更高層次的真實」。[59]

雖說以文學反映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實，是《文學二二八》編者群賦予其書最大的期許，然而，其所謂的歷史真實是有所指涉的。如同林雙不的選集，其所謂的歷史真實是相對於國民黨的官方版本而言；而曾健民等藉《文學二二八》所欲反映的歷史真相，除了同樣是針對官方說法之外，更是指向本土論述、台灣民族主義者論述。

五、二二八小說選集的脫軌
——文學選集，非關文學

在泛政治的社會之下，歷史二二八與文學二二八已然密不可分，談二二八文學很難不牽涉到其事件的歷史定位，一談到歷史定位，勢將引燃多方戰火。因此即使是二二八文學選集，也成為論述交鋒的對話場域。

（一）《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民間立場與官方霸權的對話

在編選序文中，林雙不展開了他與政治人物的隔空對話，先是批駁李登輝「一再重提二二八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談話，再引述俞國華「滿清入關」論，諷刺俞國華顯露了「自外於台灣人民、台灣鄉土的心態」。據此，林雙不做出結論：

> 長久的抗爭經驗告訴我們，外來統治者的特徵就是永遠的高壓與剝削……。歷史的鐵則召示告訴我們，唯有被統治的廣大人民展現實力，不然任何的要求與渴望均將枉然，甚至反而導致更大的迫害！力，生與死的抗爭，自由與禁錮的抗爭，尊嚴與奴性的抗爭，我們唯一的憑藉，也是力！二二八的一切訴求，當然也不例外。[60]

可以說，林雙不是站在與官方論述對立的「被統治的廣大人民」的民間立場，以民間立場斥責「統治者國民黨政權」於事發當時對事件的掩蓋，以及四十年後仍推委罪責，不肯認錯。

58 橫地剛，編者語二〈台胞的眼睛是雪亮的〉，《文學二二八》，頁24。
59 陳映真，〈序文〉，《文學二二八》，頁6。
60 見《二二八台灣小說選》〈見證與鼓舞——編選序〉，未編頁碼。

作為二二八小說選集的開山祖，林雙不期以文學流通二二八事件，要以此選集揭露官方罪責，以此選集期許「被統治的廣大人民」展現實力，爭取「生」、「自由」與「尊嚴」，而文學，便是啟蒙與鼓舞這份力量最佳角色。

（二）《無語的春天》——女性二二八與男性二二八

相較於另外兩部選集清一色的男性觀點，「女性視角的二二八」在《無語的春天》有了較突出的呈現。《無語的春天》除卻與林雙不重複的五篇小說之外，另選了李渝、蕭颯、李昂三位女作家作品，其中李渝與蕭颯的作品皆為林雙不選集的遺珠。

就二二八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而言，早期女性人物通常容易被當成國家的人格化象徵，[61]如〈黃素小編年〉中的黃素，象徵台灣人無奈被壓迫的命運。這樣的人格化象徵之所以成立，源自於「團體」特徵（被想像出來的）凌駕於「個人」特質之上，一旦以團體特質代替個人特質，作為性別上的、人的個人特質便被忽略，因而，女人特屬的苦難也被忽略。其後，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逐漸發展到以女性作為族群融合的媒介，如楊照〈煙花〉。這類的聯想便關乎女性的身體。在父權社會的性別意識裡，女性的身體被教養成是神秘且神聖的禁地，除了以愛作為唯一開啟的鎖匙之外，也該專一、忠於這愛的對象。因而，當這神聖禁地開出愛的花朵的時候，仇怨盡泯。更重要的，女性身體專有的孕育生命功能決定著社群的品種與種族的純潔，[62]也是新生命、新希望的來源。個人生命止於己身有時而盡，而功過善惡、仇恨與恩澤有世代延續的可能，也有消融與轉化的可能，經由女性身體所孕育出的新生代則血脈相溶、再無分你我，仇恨自然終止。

就寫作二二八小說的女性作者而言，女作家也寫出了迥異於男作家的二二八經驗。許俊雅便提出兩性作品的差異：

> 男作家作品較偏重對事件發生原因的探索、事件的意義、歷史的真相、

61 國家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或者說它就是一個女人。人們認為，女人「不僅是女人」，還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徵。在這種情形下，女人不是人，或者說不是個人。在男人的話語中，女人被表示為一個團體，充滿了一些（想像出來的）特徵，這些特徵跟國家的特徵很相像。如，我們習慣於說「祖國母親」、「故鄉母親」。克內則威克（Knezevic， Djurdja）著，北塔、薛翠譯，陳惠芳校，〈女人與國家〉，見陳順馨、戴錦華編選，《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2004），頁143。

62 關於女性身體與種族、國家的關係，參見布塔麗婭（Butalia，Urvashi）著，李玉霞譯，劉健芝、許朗養校，〈沉默的問題：分治、婦女與國家〉，見陳順馨、戴錦華編選：《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頁98。

> 政治國家的認同等等，女作家偏向處理遺族的精神結構與心靈樣態、庶民日常生活的呈現、歷史記憶的虛實、歷史苦難中的救贖等等。[63]

李渝〈夜琴〉與蕭颯《返鄉箚記》正是從「庶民日常生活」切入，並表現出女性的家國態度。吳爾芙（Viginia Woolf）於1938年便已提出的：「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任何國家」的話語，[64]吳爾芙此語出於反戰的語境之下，如同李渝〈夜琴〉裡的女主角不管當朝主政者誰，只期望戰爭過去，與愛人親侶相守，回歸平凡單純的生活；蕭颯《返鄉箚記》的女主角雖然也希望國家強盛，但終究是期待不受欺侮的國家能帶給百姓安定尊嚴的生活。

解嚴後，在女作家筆下，女性與國家的關係逐漸複雜化、個別化、具體化。李昂便以「鹿港式」的怪誕詭譎氣氛營造一種陰慘詭異的色彩，詮釋個人風格的二二八歷史記憶，在並置政治禁制與同性戀的情節裡，以慣常的女性主義者立場批判國家機制與父權意識對女性的聯手迫害。[65]

若將二二八小說當成是參與民族集體記憶的建構，則女性經驗的二二八小說便意義重大。安蘿（Cynthia Enole）提出民族運動通常醞釀自男人的經驗，而不是女性的經驗，也就是說，民族主義通常從男性化的記憶、男性化的屈辱和男性化的希望中產生。因此，如果能夠突出婦女的經驗，民族主義便會有不同的面貌。[66]在〈往事並不如煙〉一文中，許俊雅說明她為選集取名「無語」的雙重指涉：

> 在編輯過程中，我只能一次次回思那無語的台灣女性，書名《無語的春天》，既是對無限生機的春天發生這樣的事，天地也要為之無語；同時也是這些被波及的女性，她們總是無語提煉了苦難，消化了苦難。[67]

許俊雅以「被席捲走的男人，留下了暗夜獨自飲泣的女性，然而她們卻以隱忍之姿走過歷史」，強調小說中女性的二二八經驗；也引現實歷史中，花蓮張

63 許俊雅，《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頁29。
64 維金尼亞・吳爾芙（Viginia Woolf）著，王蔵真譯，《三枚金幣》（台北：天培文化，2001），頁153。
65 同註63，頁29。
66 引自沃爾拜（Walby， Sylvia）著，吳曉黎譯，潘永忠校，〈女人與民族〉，《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頁77。
67 許俊雅，〈往事並不如煙〉，《新台灣》414期，2004.03.18。

七郎之妻「堅強而浩氣凜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控訴執政當局的不仁不義」為令人尊敬的典範。《無語的春天》不只是三本選集中唯一沒有忽略女性經驗的二二八選集，使女性二二八小說在選集中佔有席地，也讓原本無語的女性二二八經驗浮出歷史表面，得以參予民族記憶的建構。

（三）《文學二二八》——大中國論述與本土論述之爭

若說林雙不的選集在於對國民政府的抗爭，許俊雅的選集突出女性經驗，則，曾健民選集的目的則在於補充文化資本以與本土論述對話。

《文學二二八》的編者群除了批駁前兩選集所選的小說多為「後日談」，且已被「政治圖騰省籍情節」所渲染之外，陳映真更積極的提出出版《文學二二八》的三大意義。首先，以這些新史料的出土來證明事變當中，省內、外人士相互保護、相互理解、共同鬥爭的歷史現實。這些作品可以證明事件當時，省內外人民存在著的是可以相互理解、同情、可化解的相對性矛盾，而並非後世所誇大的省內外人民相仇、殺傷的絕對性矛盾。

其次，釐清二二八事件的意義：

> 二二八事變是1946年到1949年全中國人民反蔣、反獨裁、反貪腐，要求民主、和平建國的國民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是舊中國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與全國被壓迫民主人民間的矛盾與鬥爭的一個環節，決不是「外來」「中國政權」和「外省人」對「台灣人」的「殖民壓迫」的統治。[68]

二二八事件是「全中國人民反蔣、反獨裁、反貪腐，要求民主、和平建國的國民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而非關台灣獨立。

最後，徹底顛覆由「台灣反民族政治」和歷史論述的「原教主義」教條，所發展出來的「台灣民族主議論」、「國民黨再殖民台灣」等意識形態。《文學二二八》的出版，「為反民族二二八論挖開了關鍵性的墻角」（曾健民 2004：5）。

當民族的建構極大成分仰賴於集體記憶時，記憶的內容、記憶的方式、記憶的流傳，成了不容忽視的關節。從《文學二二八》四篇序文、編者語看來，這本二二八的文學選集一開始就主動介入當前二二八論述的力場，林雙不、許

68 曾健民等編，《文學二二八》，頁13。

俊雅的選集不是它最主要的對話對象，它的角力對象實是當前的本土二二八論述，而藉由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所欲駁斥的是：二二八事件不只不是台獨運動者的起義，也沒有引發台獨的結果，所謂「台灣民族」只是台獨論者「自我複製的歷史虛像」（曾健民 2003：10）。《文學二二八》是編者所提出的證據也是媒介，是中國民族論者向台灣民族論者的挑戰。

六、餘論

本論文上半部所論及的二二八小說，實可稱為「被遺忘的二二八小說」，這些被學者從各角落挖掘出土的小說，不只將改寫二二八小說的發展系譜，也使以二二八小說作為對話的論述場域再添力場（ field of force ）。如夢周〈創傷〉的出土，使得許多曾經被稱為「第一篇描述二二八事件的小說」全向後移位；白駒的《梅春娘》除了許俊雅的《無語的春天》書後附錄曾列名之外，目前也無評論論及，補上《梅春娘》，除了為反共文藝政策下的文學創作再添一例之外，也補充了六〇年代的二二八創作，使二二八小說的發展系譜更完整，而《梅春娘》得獎、連載、出版、再版的發表過程，也可佐證六〇年代二二八事件於公共領域上的禁忌狀態究竟為何。《梅春娘》反共立場的二二八論述，與親共黨階級論述的〈烽火鐘聲〉，將使二二八小說的對話網絡再添一力場。再者，受到岡崎郁子大力薦舉的邱永漢《濁水溪》等作品，也說明了台獨理念的二二八觀點早於五〇年代就出現；而曾經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林文堂、也可算是自傳體小說的《台灣哀史》，更證實了台獨立場的二二八觀點絕非後日談，也不屬「自我複製的歷史虛像」。

本文下半部雖說以三本選集為評論文本，實則重點放在立場較為鮮明的林雙不與曾健民選集對話交鋒的場域之戰。[69]首先，這三本選集的出版社立場鮮明，也加強了其間的對話關係。前衛出版社與玉山社[70]一向以出版台灣本土文

69 此處需要強調，許俊雅《無語的春天》為李登輝學校授課教材之一，被凱達格蘭學校列入「台灣文史系列」讀書會活動的研討書目，也入選為「50本最能孕育臺灣人文意識與臺灣意識」的書目。即，若論《無語的春天》之場域位置，仍應視為與統派對立、偏向林雙不台灣本土一邊。

70 前衛出版社成立於1982年9月，是80年代以來最具本土特色與台灣精神的專業出版機構。前衛秉持本土意識、人文精神、社會關懷職志，最初以台灣本土文學為出版大宗，在戒嚴時代，識者咸認前為是台灣文學的最後堡壘。至今，前衛出版社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化的出版重鎮，及反對運動著述的大本營。其中《台灣作家全集》的出版，更是台灣新文學發軔

史書籍為主，前衛出版社更被認為是台灣本土文化的出版重鎮，及反對運動著述的大本營。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則屬於由陳映真與曾健民一同主持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可說是繼人間出版社之後的另一統派陣營。這兩大出版陣營一向以台灣本土與大中國立場著稱。各自擁有出版社作為發言平台，統獨兩派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可算是勢均力敵。[71]其次，幾乎被當成統派精神象徵的陳映真，即使未參與選集編輯，也是撰寫選集序文的首選；而林雙不在本土陣營中，也足稱為新世代代表人物，雙方所具的象徵資本足使選集錦上「添花」、「添色」。

曾健民與林雙不對事件的理解與所強調的歷史真相，究其實是一種「效果歷史」。[72]他們當然關心 1947 年 2 月 27 日那天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事件，痛心數以萬計被殘殺的生命、被踐踏的心靈，但更不能釋懷馬虎的是「它們所產生的效果」。本土派堅持二二八引發了台獨的結果；統派一方面極力否認這「歷史效果」，一方面理解出另一種效果「祖國革命的一環」。對立雙方針對同一件事進行詮釋，雙方各是其所是，一個歷史，各自解讀。

文學選集透露二二八歷史難能達成共識的爭議，在新出版的《台灣政治小說選》也得到輔證。2006 年 8 月，由邱貴芬所編選的《台灣政治小說選》未有任何一篇二二八小說入選，邱貴芬在序〈政治小說：勾勒願景與希望〉解釋她未選二二八小說理由。首先，她認為，二二八小說在臺灣政治小說選的缺席，「代表臺灣政治的創傷與願景並非全然可以透過文字來救贖與勾勒。」然而，不選二二八小說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

> 「二二八」這最政治的符號，本選集卻無代表作品，因為二二八如何敘

以來劃時代集大成的創舉，為台灣人精神上所企求追尋的心靈故鄉開拓出一條明亮道路。玉山社1995年成立，創立之始，就確立以「創造台灣文化尊嚴」為主要目標，希望藉著台灣人文、歷史、自然書籍的出版，發揮影響，建立台灣人的自信與尊嚴。

71 2006年，人間出版社出版《二・二八：文學和歷史》特輯，書中再度收錄夢周的小說〈創傷〉、散文〈難忘的日子〉，曾健民所寫的〈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中，再度批評當前的二二八論述「日益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論述呈現「非歷史性的問題」，「這使二二八事實遠離了『歷史』，成為分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二・二八：文學和歷史》並非純文學選集，此處不列入討論。

72 根據效果史的觀點，歷史學的興趣不只是注意歷史現象，歷史遺跡或關於歷史的記載，而且還在意義的層面上關注它們產生的效果。加達默爾甚至認為「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顯示歷史的實在性。……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韓震、孟鳴歧，《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上海：上海譯文，2002），頁11。

> 述，該如何對待，仍是最難解的政治問題，無法以一篇作品「代表」。編者力有未逮，猶待讀者補遺。[73]

編選台灣政治小說選集，對於「最政治的符號」、「代表臺灣政治的象徵」的二二八小說，卻無法找出「代表作」而寧可讓它空白缺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定位人言言殊、眾聲喧嘩的場域論爭可見一般。而，二二八空白缺席的結果，竟然與二二八被嚴格管控的戒嚴時代如出一轍。只不過，當年的空白，是面對威權體制不能說不敢說之下的被動結果；如今的缺席，則是不願涉入眾聲喧嘩紛爭後的主動抉擇。

當看待二二八歷史的觀點關乎生命安全，當二二八歷史的定位重大關乎台灣的定位，理應以文學為首要標準的文學創作與選集，似乎也陷入非關文學的宿命了。

73 選集收錄了從1932年到1998年的政治小說各時期代表作品。邱貴芬，《台灣政治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2006）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人間出版社編委會編，《二・二八：文學和歷史》（台北：人間，2006.03）。
王德威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5.09）。
白駒，《梅春娘》（台北：文壇社，1964.11）。
林雙不編，《一九八七年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1987）。
林雙不編選，《二二八台灣小說選》（台北，自立晚報，1989）。
林文堂，《台灣哀史——蔣政権と戦い続ける独立運動者の手記》（東京：山崎書房，1972.02.25）。
邱永漢，《濁水溪》（台北：允晨文化，1995年8月5日初版）。
邱永漢，《香港》（台北：允晨文化，1996.02）。
邱貴芬，《台灣政治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2006.08）
夏春祥，〈尋找公共領域：論台灣社會中的新聞論述〉，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
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
封德屏主編，《台灣文學出版——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北：文建會，1996）。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1991）。
陳順馨、戴錦華編選，《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陳興唐主編，戚如高、馬振犢編輯，萬仁元審校，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下卷】（台北：人間，1992）。
曾健民研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3）。
《第二屆苗栗縣文學——燿日明月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4）。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3）。
維金尼亞・吳爾芙（Viginia Woolf）著，王葳真譯，《三枚金幣》（台北：天培文化，2001）。
橫地剛、藍博洲、曾健民合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4）。
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2003）。
鄭明娳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1998）。
韓震、孟鳴歧，《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上海：上海譯文，2002）。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2002）。

二、論文

許俊雅，〈往事並不如煙〉，《新台灣》414期，2004.03。

應鳳凰，〈文壇社與穆中南〉，《文訊月刊》19期，1985.08。

《文壇》34期，1963.04。

《文壇》36期，1963.06。

三、電子媒體

《中華日報》，（來源：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5Swc_U1IfB4J: www.pu.edu.tw/~ecology/taiwan/c-6.htm+%E5%9C%8B%E6%B0%91%E9%BB%A8%E9%BB%A8%E5%A0%B1%E3%80%8A%E4%B8%AD%E8%8F%AF%E6%97%A5%E5%A0%B1%E3%80%8B&hl=zh-TW，2005.11.15.）。

司馬文森，（來源：http://www.dqcx.net/xd/sima-wensen/000.htm，2005.11.15）。

范泉，（來源：http://www.bjyouth.com/view.jsp?oid=5278594&pageno=1，2005.11.20）。

前衛出版社、玉山社介紹，（來源：http://64.233.167.104/search?q=cache:kdev7cVgfJ8J:）。

解放軍文藝社，（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7/29/content_999320.htm，2005.11.15）。

四、【附表】三本文學選集選錄小說

小說篇名 （以發表日期排序）	林雙不 《二二八台灣小說選》	許俊雅 《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	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 《文學二二八》
〈農村自衛隊〉	✓	✓	✓
〈冬夜〉	✓		✓
〈創傷〉			✓
〈台灣島上血與恨〉	✓	✓	✓
〈沈醉〉			✓
〈鵝仔〉			✓
〈三月的媽祖〉		✓	
〈台灣姑娘〉			✓
〈烽火鐘聲〉			✓
〈黃素小編年〉	✓	✓	
〈泰姆山記〉	✓	✓	
〈夜琴〉		✓	
〈西庄三結義〉	✓		

《返鄉劄記》節選		✓	
〈抗暴的打貓市〉	✓		
〈煙花〉	✓	✓	
〈風雪的底層〉	✓		
〈紅鞋子〉	✓		
《後山日先照》節選		✓	
〈彩妝血祭〉節選		✓	